

雲南史料叢刊

● 方國瑜主編

徐文德 木芹 葛榮校訂

● 全 20 卷

第 1 卷



雲南史料叢刊

● 方国瑜 主编 ● 徐文德 木芹 纂录校订 ● 第 1 卷



责任编辑：李惠铨

封面装帧：徐 芸

云南史料丛刊（卷1）

方国瑜 主编 徐文德 纂录校订
木 芹

•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昆明市书林街100号）

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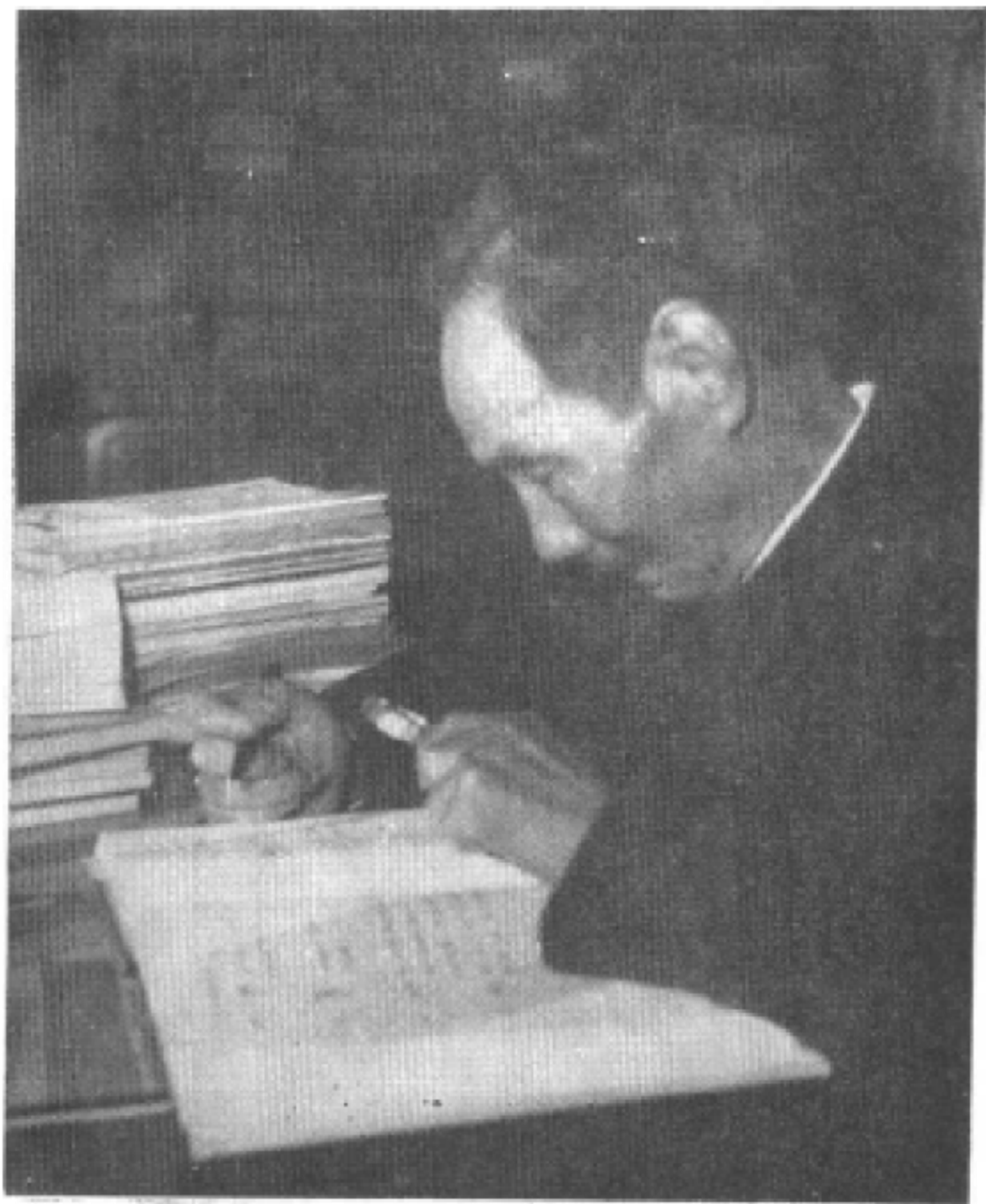
•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4.75 字数：350,000

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（格装1,500）

ISBN 7-222-00604-4/k·112 定价：8.05元（精装）



方國瑜教授



云南大学历史系地方史研究室在集体研究《云南史料丛刊》的修订

从右至左为：郝志惠、徐文德、林超民、方国瑜、木芹

前 言

马克思说：“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，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，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。”（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二版跋）毛泽东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一文中也指出，“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，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”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进行研究的第一步，是详细地占有材料，研究一切问题必须如此，研究云南历史也不例外。

为了占有材料，必先搜集整理材料。这是比较繁重的工作。但是，不能指望所有研究者都致力于此，需要有人肯出气力，把详细的材料提供出来，给研究者得到方便。前人已意识到这一点，在整理云南历史资料方面，已经作出过一些成绩。如师范（蕙屏）作《滇系》凡四十册，其中《典故系》八册，《艺文系》十八册，占全书过半。又王崧（乐山）作《云南备征志》，收集前人纪载滇事之书，汇编成二十一册。陈荣昌（小圃）重刻《备征志序》称此二书为滇中掌故之尤著者。师、王之书一刻再刻，历年印刷，流传甚广。研究者“得此一编，众本咸在”，有很大方便。近世秦光玉（朴安）作《续云南备征志》三十卷，仅排印过二册，惜未完工。像这样网罗史料，汇编成书，少数人出力，多数人应用，对于研究云南历史是有益的，也是必要

的。

2275/103
编纂史料成书，供研究者应用，首先要求完备而且确实，使研究者信得过，用得上。但前人所作，由于时代局限，所见不周，不免粗疏；又作者大都为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，其编书的立场、观点是很成问题的。如《滇系》取材，多不注出处，令人难索解；注出处者，文句又多更易，而于书中删润原文，往往有之，其附论亦多空乏。

《备征志》搜录虽勤，犹多未尽，全书仅六十余万字。秦光玉《续备征志》亦非完备之作。又师、王二书，今之通行排印本及刻本，因辗转传抄翻刻，未作精校，字多讹夺，且有错简。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提高，把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，是新时代提出的要求，也是今天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这部《云南史料丛刊》的编纂，始于一九六五年。当时被列为重要的教学与科研项目之一，既为教学参考之用，也提供给留心这门学科的研究者。才刻印第一集，不久，文化大革命起，原订计划被迫搁置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拨乱反正，万象更新，这项工作又于一九七八年六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。经过五年的努力，已刻印五十六辑，约六百余万字，分送有关单位和个人征求意见。我们编辑《丛刊》，始终把握两条：一为提供资料，一为提供意见。为贯彻这一精神，分为“概说”、“正文”、“后记”三个部分。提供资料，则求其完备而且确实。凡涉及云南历史之专书、专卷、专篇、专条，靡不收录。此外尚有专条的辑佚、摘录。但对

于文物资料的收录，只限于有文字记载者。为求史料之确实，凡收入本丛刊的史料，均据原书善本作校刊、考辨，注明出处；或作附录，供读者参证。

向研究者提供意见，主要是方国瑜先生所撰之“概说”（多录自中华书局出版之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，略作修改）。在每篇史料之前，著录文献、文物名目，略作说明。前人之作，有称叙录、解题、提要、题记、题跋、概论等，今称“概说”，意为大概说说，不计详略，不拘一格，结合史事抒发意见。其主要则有二事：一为史料之来源，一为史料之阶级性。

云南地方的历史资料（撰述与文物），存在至今者甚少，而这为数不多的史料，或因出于统治阶级之手，歪曲、诬蔑、捏造者逐处有之；或在其流传过程中，人们辗转传抄、翻刻，以及注解、评论，各本文字有讹夺、点窜，解说有曲直、异同。所以，阐明史料之来源、版本流传，结合史事之时间、空间与撰人之活动，进行考究和批判，恢复其初文、初意，辨别其曲直、异同，才能确定史料的价值所在。其来源过程，有在史料本身已说明，亦有未具，当进行考察。兹举重要者，如：司马迁作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，所载事迹，取自档册以外，因曾从军亲至西南，任中郎将，为经略此地区进行调查研究，故所作记录多有依据。又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西南诸郡之水道、矿产，则据郡县所报而编纂之地理图志，为经过调查之记录。又《后汉书·西南夷列传》载哀牢夷事，出自杨终《哀牢传》，为哀牢使者所述。应劭得杨终之书录在《风

俗通义》，范晔又得应劭之书转录于《西南夷列传》。又《通典·边防典》“松外蛮”条，记西洱河风土，为杜佑得梁建方出兵至西洱河时之记录。又樊绰《云南志》，其卷二至卷十，录自袁滋《云南记》，而袁滋书录自出使南诏时所得地方图志之书。又《新唐书·南诏传》载风土二千余言，部分出自樊绰书，其余出自徐云虔使南诏时所作《南诏录》。凡此，史料本身并未言之，经过考究，大略可知。

亲身经历之作，也未必尽符事实，当辨明其事。如魏晋间亲至西南者作《永昌郡传》，所记之“尾濮”；元李京亲至云南各地，作《云南志略》，所记之“越嵩罗罗”；明万历间随军亲至云南者作《西南夷风土记》，所记之“地羊鬼”；说有其事，实则无稽之谈，蓄意诬蔑，如此者甚多。

至于纂录之书，虽依据记录而有未经审核者。如：酈道元《水经注》，征引有据，而以意贯穿水道，有错杂难明，或无其水者。又常璩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，稽诸旧纪，纂录成书，因取诸家之说，有先后不一致者。若此之类，后人编书多不免有。

又有依据记载而窜改文字者，如《元史·地理志》州县沿革之大理时事，据《云南图志》，《图志》有所本，而窜改称号，以致年代不清。万历《云南通志》记民族，改易前志“白”、“爨”用字，后来有从前志，有从万历《志》，以致错乱不堪。乾隆年间聚珍版丛书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《云南史记》之文，而改易书名为《蛮书》，意

在诬蔑，不知者盲从之。故所录资料有依据，而因无知或蓄意窜改原文，以致令人迷惑者，往往有之。

又纂史之书，编者自述史料来源及其所作伪说以欺世人。如：《滇载记》出自《白古通·绎年运志》，早已有汉文传本。明嘉靖初，姜龙得张云汉抄本，付杨慎稍为删正，而杨慎冒名为己作，自言译白文《玄峰年运志》为书，李元阳亦称道之，实一骗局。《云龙记往》为董明善作，王文凤得之改署己名，章学诚又得之收入《实斋文集》，并自言删正。实则三本几全同，王、章抄袭而冒名己作，其行可鄙。至于《南诏野史》，伪托杨慎撰；《白古通浅述》伪托赵顺撰，乃后人比附，并非有据。

尚有虚构史事者。如《隋书·史万岁传》之“西洱河诸葛亮碑”，樊绰《云南志》之“石城诸葛亮碑”，其事离奇不可究诘。更有甚者，宗教迷信之神话传说，娓娓动听，实则无根之谈，莫究其始。

更重要者，则为洞察史料之社会性，即阶级性。所有历史资料，都有其意图，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，须结合历史实际进行综合研究，揭露撰人之政治倾向与实际目的，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，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。云南地处边陲，少数民族错杂而居，社会经济、文化发展比内地落后，历代王朝设置政区，适应社会基础，秦汉以来有内郡、边郡之分，隋唐以来有内州边州之别；政权形式虽有不同，国家主权则无二致。但是，由于统治者之偏见，歧视边地，认为“化外”羈縻，实行大民族主义压迫，更使其发展延缓。史家倡“异内外”之说，发挥“尊王攘夷”、

“夷夏大防”等反动观点，为统治者作伥，史籍记录缺略不实，且多诬蔑之辞。如班固《汉书·序传》说：“西南外夷，别种殊域”；用“外”、“别”、“殊”之贬词，历来史籍多如此，故长期以来，云南地方历史遭到歪曲，真相被隐晦。更有甚者，中国封建史学家的谬见，在近代被外国野心家利用来为其侵略、分裂中国服务，他们胡说：中国不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各民族国家，而是帝王征服为动力，在历史上无稳固的疆界；中国历史上的边界，西部不超过甘肃、四川；云南是印度支那半岛诸国之一；等等。这无疑是必须严加驳斥的，但也要看到，其立论的主要依据，乃是中国封建史学家的某些错误记载。所以，对典籍作一番批判性清理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，让外国野心家无空子可钻，乃批驳其谬论之上策也。

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整体的一个部分，云南历史的发展过程与全国形势息息相关，在各时期情况虽有不同，其本质则毫无差别，因云南地方曾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郡、边州，就把它视为“别种”、“殊域”、“化外”，是十分错误的。又，忽视边地各族人民与中原人民之间的经济、文化联系，看不到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中国的历史，而把统治者当作历史的主宰，乃是唯心史观。

凡此种种，我们都试图在“概说”中加以讨论，惟限于理论水平低，知识亦疏陋，所提意见未必确当，错误在所难免。望读者匡之正之。

本《丛刊》在概说、正文之后，还有后记。后记出自

诸编辑人员之手,其内容主要是对正文校刊所据版本加以必要的说明和解释,也补充一些概说中未提到的意见。

《云南史料丛刊》之油印本,乃随作随编成集,陆续交坊刻印,其时序、内容均未遑顾及,查阅起来很不方便。故这次交云南人民出版社排印出版,重加编次和校订,并有所增删,为二十卷。其分卷篇目,要者依时序、按内容及数量(每卷三十万字左右)而定,比刻印本更方便读者也。

云南大学历史系地方史研究室

一九八三年八月

方国瑜传略

林超民

先生姓方，名国瑜，字瑞臣，云南省丽江县人，纳西族，清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正月十八日诞生。因不通汉语，九岁始发蒙读书。自谓“资质粗笨”，故勤奋补拙。读《论语》“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”之句，不甘居下，自署书屋为“困而好学斋”以自勉，促居书屋，终日伏案，所读四书五经诸子之文，至老犹能背诵如流。

1922年夏，先生毕业于旧制中学，乃离乡远游，1923年4月到达北京。1924年，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，以学习勤奋、品学优良见重于师友。先生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《向导》周刊上接受民主革命思想，以“读书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读书”相号召，积极投入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。

简在京主办革命刊物，便主动与他取得联系；又通过张伯简认识了《向导》周刊的发行人李树青。在担任全国学生总会干事期间，先生与谢伯峙、吴平地（中共党员）等共同组织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学学生去天安门参加示威游行，高呼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、“打倒军阀”等口号，要求赶走黎元洪、曹锟，迎接孙中山先生来京组建“临时政府”。当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时，先生被举为学生代表，进入火车站月台迎接孙中山先生入京。

1925年，先生参加天安门广场举行的“五四”运动纪念大会。游行示威时，先生奋勇当先，与警察英勇搏斗，右臂被打伤。先生不因此畏惧退缩，斗志愈高，为揭露上海“五卅”惨案的暴行，在伤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，毅然率领一个学生小分队到天津、济南、南京、扬州等地宣传。返京后，先生即加入云南左派学生组织“新滇社”，并主办《云南》周刊，积极鼓动革命。

1926年夏，先生患大病住院，不久休学回家。1927年龙云等四镇守使发动云南“二·六”政变，战乱蜂起，土匪横行，先生困在丽江，埋头读书。1929年秋，北上复学。因挚友谢伯峙、吴平地于1927年4月与李大钊先生同时被捕，又同时慷慨就义，先生无法与党取得联系。因大革命失败，学生组织涣散，学生运动沉寂。而“整理国故”之风方兴未艾，先生乃立志于国学研究，为中华民族争光。复学时便要求入北师大国文系本科，系主任钱玄同，以先生在预科读书时已有几种著述，准许跳级，直接在本科二年级注册。

1930年春，在钱玄同的鼓励下，先生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，同时在两个学校研读，先后从钱玄同、余嘉锡、马衡、刘复诸先生，攻蕺音韵、训诂、目录、校勘、金石、名物之学，又得高步瀛、吴承仕、黎锦熙诸先生的指导。与此同时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垣（援庵）见先生所写《中国道教史》颇有见地，知先生是边疆少数民族学生，殊为器重，指导他选修大量史学课程，并从杨树达、梁启超诸学者治史地之学。先生回忆说：

“我在北京求学期间，多闻议论、开阔眼界，稍知读书门径，想以学术上成就最高的几位先生为榜样来深造，曾刻意读《章氏丛书》，觉文笔深奥、论说抽象；又读《饮冰室集》，觉感情奔放、议论酣畅；读王国维、陈援庵先生的论著，感到朴质存实，方法严谨。读王先生书，将创新意，作文议论；读陈先生书，有所补苴，多作札记。因此王、陈两先生对我影响较大。还有冯承钧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作数十种，也有人翻译日本学者所作西域南海论著，我都细读，增益新知。”这段时期，先生纵观四库典籍，广及海外译著，钩稽故实，发微阐幽，多有论著发表于报刊，为学术界重视。先生生前清理30岁以前存稿，认为可取而亲自编定者，有《广韵声汇》一书（共三十八卷，分装两函十二册）；《困学斋杂著五种》，包括《广韵声读表》、《隋唐声韵考》、《慎子考》、《慎子疏证》、《论学存稿》。尚有《说文声汇》、《释名声汇》、《石鼓文研究》、《论语朱注匡谬》等底稿若干册。

1932年，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

系本科，第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。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编辑员、洛阳师范学校教师、北平私立民国大学国文系教授。当时，刘半农任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，建议先生回乡整理研究纳西象形文字。1933年秋，先生回到故乡，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、巨甸等地考察，首次发现纳西标音东巴文摩岩，向东巴经师学习，调查记录了大量东巴文资料。1934年6月满载纳西象形文字资料回到北京。不久，刘半农先生病歿，经董作宾介绍，到南京向赵元任、李方桂两先生学习语言学，用国际音标给纳西语标音，编成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科学的《纳西象形文字谱》。

先生回乡搞纳西象形文字时，在昆明与袁嘉谷先生会晤，纵谈滇人旧学，深得袁的赞许。当时周钟岳、由云龙、赵式铭、方树梅等正筹办纂修《云南通志》，希望先生能参与其事，先生遂有心于云南史地之学。回北京时，携带《云南备征志》、《滇系》诸书，潜心研读。1934年秋，先生在南京寄住历史语言研究所，所内藏书十分丰富，南京图书馆又多有善本，得尽情纵览，约一年时间，辑录云南地方史料盈篋。先生后来成为云南史学界巨擘，其根基于此奠定。

时值中英会勘滇缅边界，英、法帝国主义覬覦我云南边疆，蚕食鲸吞，凶相毕露。先生痛感清季外交丧权辱国，满怀爱国义愤，撰写文章，考证中国西南边疆沿革，以历史事实痛斥英、法侵略者无耻谰言。由此，倍感史地之学在维护祖国统一、反击侵略中的重大作用，立定志

向，专攻西南史地之学。先生所撰《纳西象形文字谱》成初稿后，携往苏州拜谒章太炎先生求教。同时拜谒李根源先生，以云南史地请业，李根源先生肯定其成绩，并指出所论史务多空洞，建议深入边界，实地考察。经李根源推荐，先生回云南参加界务交涉。1937年9月到滇西边地考察，亲履傣族、拉祜族、佤族地区，写成《滇西边区考察记》等专著。此书迄今乃为学术界推崇，为民族学、边疆史地之学的重要参考文献。

1936年夏，经袁家谷先生一再邀约挽留，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，先后任文史系教授、文史系主任、文法学院院长。1938年后，又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、审定、续修之职，撰写了《建置沿革》、《疆域考》、《金石考》、《宗教考》、《族姓考》诸目，并参加了全书的编纂和审定工作，为《新纂云南通志》的编纂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
编《新纂云南通志》时，曾拟议由先生任总纂，并到重庆审定全书；为此，当局举先生为伪立法委员，既有名望又有高薪。当时通货膨胀，文人收入低薄，先生家计殊为困难。但是，目睹反动政府贪污腐败、营私舞弊，先生以要做清白正直的学人，不为肮脏奸滑的政客为宗旨，严辞拒绝。不久，当局又以“社会贤达”名义推先生为国大代表，以高官相邀，以重利引诱，尽管先生生活拮据非常，仍不改初衷，多次通电省选举委员会和丽江选区，坚决推辞，而专心于教学和著述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先生邀约凌纯声、向达、楚图南、闻